

论资本逻辑与现代性文化

张三元

摘要：现代性文化即世界性文化，亦即文化全球化，它根源于资本逻辑，是理性形而上学和资本权力“共谋”的结果，资本逻辑的根本价值取向即是它的根本价值取向。现代性文化在本质上是为资本服务的，是资本的观念形态，是资本最柔软、最敏锐而又无孔不入的触角，或者说，它本身就是资本逻辑的一部分，是资本逻辑的具体运用和展开，因而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因此，理解和把握现代性文化的实质，就必须紧紧抓住资本逻辑这个根本，从资本逻辑与现代性文化的内在关联与冲突中把握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资本逻辑；现代性文化；困境与出路；《共产党宣言》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国价值的跨文化传播研究”（18AKS004）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3-0071-07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或资本批判内蕴着深刻的现代性文化批判。特别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现代性文化产生的根源及其实质，开启了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历史性过程。柏曼和汤林森根据对《共产党宣言》的解读，认为马克思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共产党宣言》可以视为文化现代主义的宣言”^①。我以为，柏曼和汤林森的观点不够彻底。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柏曼和汤林森没有抓住《共产党宣言》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逻辑的揭示与批判。就此而言，马克思不是一个现代主义者，而是一个现代主义的批判者；《共产党宣言》不是文化现代主义的宣言，恰恰相反，它是对文化现代主义即现代性文化批判的宣言书。也就是说，理解和把握现代性文化的实质，就必须紧紧抓住资本逻辑这个根本，从资本逻辑与现代性文化的内在关联与冲突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一、现代性文化的形成及其实质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使用“现代性”一词，但我们可以从文本中获得确定的理解：现代性即资产阶级社会或现代社会，或

者更准确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或现代社会所具有的一种特性、结构和功能。所以，现代性文化首先指的是一种资产阶级或现代社会的文化。这主要是从现代性文化的阶级属性上讲的。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现代性文化的产生及其实质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揭示了现代性文化的特质：理性的崩溃或极端理性的疯狂。在西方传统哲学看来，理性是现代社会建基的原则，是自然、社会、历史以及人自身的普遍通约之物。这种纯粹理性被马克思指认为“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它遮蔽了现实生活中政治、经济、阶级冲突与对抗的主题。马克思从理性与权力的共谋关系入手，认为理性的实质是与权力统治的共谋，从而实现对人的压迫与宰制。在理性与权力的共谋下，整个社会就像“倒立跳舞的桌子”，呈现出颠倒或混乱的图景，而文化则体现出一种暴戾与快速流变的特质，它既为人的主体性建构提供基础，又与恐怖、暴力、死亡或性等如影随形。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性文化这种特质的描写可谓入木三分：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

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产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②

由于现代性具有变动不居的特质，现代社会总是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存在形式，因此，现代性日益呈现出一种趋势：“现代性始终在全球化。”^③现代性是一个过程，它从一开始就追求全球化，或者说，全球化是现代性与生俱来的特质。柏曼早就指认了这一点，认为“现代环境贯穿了所有的地理疆界、所有的氏族、所有的阶级与民族，贯穿了所有的宗教与意识形态：就此而言，现代性可以说造成了人类的统一”^④。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不是一个地方的概念，而是一个关涉世界的概念。与此相关，现代性文化并非是一种地域性文化，而是一种世界性文化，或者说，现代性文化始终是全球性的文化，亦即人们常说的文化的全球化。这一点，《共产党宣言》给予了确认：“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⑤需要说明的，“文学”一词德文是“Literatur”，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显然，世界的文化就是全球性的文化，亦即现代性文化。

这就涉及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现代性为什么始终在全球化？现代性文化何以成为全球性的文化？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之所在：“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

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⑥而且，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认了“资产阶级即资本”^⑦。也就是说，资本逻辑是现代性文化之所以成为全球性文化的真正根源，或者说，文化全球化是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权力共谋的必然结果。

资本的本质在于追求自我增殖，在流通中实现自己，不断地实现资本积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生产资本。所以资本逻辑表现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表现为无限扩张、贪得无厌的逻辑。而要实现这一“神圣使命”，资本就必须实现全球化的扩张，以整个地球为战场，原因很简单：只有“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资本增殖才能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毫不犹豫地同理性形而上学结成了同盟。资本需要理性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巩固自身，理性形而上学则需要资本来实现自己的最终利益，两者具有内在的“同构性”与“同质性”。因此，两者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结盟是顺理成章的事。区别于靠暴力发家的近代资本，现代资本乃是用理性形而上学武装起来的新式资本；迥异于以真理为最高力量和报酬的古典形而上学，现代形而上学完全仰仗资本并以利润为最高报酬^⑧。正是由于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共谋”的“这种双重的经纬，方始成为一种现实性的力量：就像这种力量一方面来自资本之无止境的推动一样，它也来自形而上学之无止境的谋划”^⑨。这种现实力量之无止境的扩张，创造了经济全球化或资本全球化，缔造出一个资本时代。这个过程首先是物质的，是资本生产的结果，或者说，是一种物化的过程，它使所有的社会关系都以物的形式呈现出来。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以太”和“普照的光”，具有强大的统治力，“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⑩。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论断深刻地体现出资本逻辑的两面性：一方面，资本逻辑是价值增殖逻辑，它体现出资本对各民族人民的剥削和统治；另一方面，它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普遍交往……使每一个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⑪。在此基础上，“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

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②，民族历史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这个过程时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③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进一步对这种“全球化”现象进行了深刻而又形象生动的描述。

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或者说，资本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必然伴随着资本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乃至政治全球化是资本逻辑的终极追求。一方面，全球化资本作为一个巨大的“社会存在”，不可能没有相应的文化立足于其上，而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也不可能不反映这个“社会存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④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任何时候都是有效的。实质上，资本到哪里，它就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带到哪里。也就是说，全球性文化或文化的全球化是以资本逻辑为根基或根本支撑的。另一方面，“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⑤。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不仅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而且还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或者说，它必然要求建立于其上的文化同样居于统治地位。

二、现代性文化的资本逻辑

现代性文化既是资本全球性扩张的必然结果，又是资本全球性扩张的开路先锋。毫无疑问，资本要“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不能没有文化的辅佐与浸淫，有时候文化甚至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意义。因此，现代性文化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资本的价值取向就是它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现代性文化在本质上是为资本服务的，是资本的观念形态，是资本最柔软、最敏锐而又无孔不入的触角，或者说，它本身就是资本逻辑的一部分，是资本逻辑的具体运用和展开，因而具有强烈的意识形

态性。

首先，现代性文化作为资本扩张的辅佐，为资本扩张提供观念和思想的基础。从根本上讲，现代性文化作为资本这个“社会存在”的反映，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它必然具有维护和批判社会现实的功能，一方面维护同自己性质相同的东西，另一方面，批判同自身性质相反的东西。正是这种维护和批判，现代性文化为资本逻辑提供观念和思想上的支持与保证。在全球化过程之中，尽管资本是主体，但文化总是与之如影随形，相辅相成。正如罗宾斯所引米勒的话，“百货公司的商品陈列和摆放方式，有助于确立一种资产阶级文化，把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态度与期望转变为商品，并因此塑造和转变资产阶级本身”^⑥。反过来讲，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它本身就体现着一种文化——现代性文化，现代性文化与资本逻辑具有同构性和同质性。正是由于这种同构性或同质性，资本逻辑体现出一种文化逻辑，而现代性文化逻辑则是资本逻辑的表征与深化。很难想像，没有一定的观念和思想作为基础，作为物化的社会关系的资本能够征服天下。

其次，现代性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资本逻辑，它必须围绕着资本逻辑运行，为资本实现价值增值服务。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现代性文化失去了真正文化的超越性和自由性特质，取而代之的是媚俗性或现世性。马克思在谈到科学和教育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占统治地位，因而科学和教学方法越是面向实际，就越是这样”^⑦。何止是科学和教学方法，整个现代性文化都是如此，它必然面对资本逻辑这个实际相一致，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资本逻辑使人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甚至，“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⑧。马克思揭示的现代性文化的这种特质，并没有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而有所改变。詹姆逊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认为今日的资本主义尽管表现出一些新的变化，但资本本性及其逻辑并未发生任何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性文化必然构筑资本逻辑的温床。阿尔都塞也指证了现代性文化的这种特质，认为随着资本的发展，“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不仅帮助统治阶级统治被剥削阶级，并且使统治阶级把它对世

界所体验的依附关系作为真实的合理的关系而接受，从而构成阶级统治本身”^⑩。因此，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有着相同的目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即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再生产。每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以其特有的方式服务于这个唯一的结果。”^⑪

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文化现象日益表现出商品化的特征，非文化领域又不断地表现出文化特征，现代性文化与资本逻辑越来越同质化甚至一体化。关于这一点，詹姆逊将之概括为“商品的意识形态性”，他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旧式的意识形态，只有商品消费，而商品消费同时就是其自身的意识形态”^⑫。这种文化的商品化和商品的文化化体现了以商品（资本）为主导的现代性文化逻辑的实质。而罗宾斯则将之概括为一种“魔法原则”，认为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魔法原则在运行”^⑬。在这个魔法原则中，货币和消费是两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因子。“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运行方式，也许我们最好可以这样概括：它是资本家、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一套关系，这些人因为追求货币而联系在一起，彼此依赖、彼此索求，往往也彼此冲突和对抗。在这种文化图式中，民族——国家的功能之一就是发挥一种中间调停者的作用，控制货币的供应和流通，设定和实施人们交往互动的规则。”因此，“对于资本主义文化来说，其成员生活的核心要素则是金钱。在资本主义文化中，消费者尽其所能地花钱，劳动者尽其所能地挣钱，资本家则尽其所能地进行货币投资并获得尽可能多的回报”^⑭。罗宾斯认为，这种概括尽管高度简化，但突出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特征和独特风格。应该说，这种概括是基本准确的，它与唯物史观的理解基本一致。马克思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生产和消费是直接同一的，生产就是消费，消费就是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在这个意义上，消费是资本存在的理由或根据。因此，在本质上，现代性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

再次，现代性文化作为全球性资本的一部分，其本身就是资本，实现价值增殖亦是它的最高使命。这不仅表现在文化的商品化，而且更表现在文化的资本化，尽管文化的商品化与文化的资本化是互为因果、相互佐证的，但文化的资本化主要体现为文化本身实现价值增殖的功能。如果说这个趋势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表现得还不够明显，“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同整个

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⑮，那么，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它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日益居于主导性地位和核心地位，引领着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趋势。毫无疑问，马克思深刻地洞见到了这种趋势，不仅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⑯，而且认为，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一样，都要遵循生产的普遍规律，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的作家，和其他雇佣劳动一样，“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⑰。在现代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当然表现为以科学技术为手段，以赚取利润为目的。可以说，现代性文化及其生产充分体现了这个规律。

现代性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是金钱，它以赚取利润为根本目的。资本驱使着现代性文化，现代性文化当然要履行资本的职能，对于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而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此，现代性文化在本质上已经完全资本化了。这也许是马克思很少使用文化一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文化已经完全依附于物质，成了物质的附庸，“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⑱。文化的特质在于内化于心，内化为人的意识、观念和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现代性文化的“熏陶”下，人们的意识、观念和思想被金钱所掌控，或者说，商品、货币、资本凝结为人们意识、观念和思想中的强大内核，主导着人们的意识、观念和思想。这可称之为文化的异化或人的思想意识的物化。关于这一点，贝尔指证道：“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构成了社会的其他所有维度。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只是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文化也成了商品，受市场评估，通过交易过程被买卖。”^⑲

现代性文化的资本功能通过文化生产集中地体现出来。现代性文化生产实质上是资本生产，价值增殖不仅是它的终极目标，也是它的直接目的。马克思曾把精神生产分为两个部分，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和“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⑳。前者是作为资本生产的文化生产，是主要的、普遍的，后者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生产，

则是次要的、个别的。恩格斯明确指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并且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④也就是说，文化生产亦如物质生产一样，是“主要的谋生之道”。即使是在第二种生产中，完全不为经济利益所驱动的生产是少之又少，因为按照卢卡奇的理解，物化已经深入到人的意识之中，成为物化意识。作为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文化生产，如果说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微不足道”的，那么在全球化过程中，随着文化工业的兴起，则风靡全球，成为资本生产的主要形式。在这种生产中，“文化工业引以自豪的是，它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换为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文化工业抛弃了艺术原来那种粗鲁而又天真的特征，把艺术提升为一种商品类型。它越变得绝对，就越会无情地把所有不属于上述范围的事物逼入绝境，或者让它入伙，这样，这些事物就会变得越加优雅而高贵，最终将贝多芬和巴黎赌场结合起来”^⑤。“贝多芬和巴黎赌场结合起来”可谓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与文化关系深刻而生动的真实写照。在资本逻辑之中，艺术把自己变为消费品不仅是资本的需要，也是艺术本身的需要，因为没有资本的支持和价值增殖的渴望，艺术也就失去了动力及其价值。

三、现代性文化下时代精神困境与出路

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是辩证的，既揭露了资本逻辑的邪恶本性，也肯定了资本逻辑伟大的文明作用。同样，马克思对现代性文化的批判也是辩证的，认为由资本扩张所促成的现代性文化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极大地促进了资本的发展，为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创造了条件，并且给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提供了相互借鉴、交流、交锋和融合的历史性契机，从而也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这既非主体性资本的故意，也非马克思对资本逻辑以及现代性文化批判的主旨。尽管正如卢卡奇所言，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即辩证批判的方法，而不是结论，但必须强调的是，辩证批判中的肯定和否定并

非是并列平行的，而是有主次之分、轻重之别的。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强调的正是在物质生产领域，全球化过程即是“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的过程。据此，可以明确地认为，随着资本全球化，“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必将终结，就是说，文化全球化必将推动资本主义文化取代地方的和民族的传统文化，这是由资本本性所决定的，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因此，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马克思揭示出现代性文化所造成的时代精神的困境。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在文化层面，现代性文化必然造成殖民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矛盾和冲突。可以认为，在资本逻辑的境域中，世界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殖民文化。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出了现代性文化的这个性质。资本全球化它“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⑥。因此可知，现代性文化的实质在于西方资产阶级依靠资本力量使本阶级的文化成为全世界的共同文化。套用马克思的话说，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各地方和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消灭得越彻底，现代性文化也就越是成为全球性文化。汤林森等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现代性是由西方强加于第三世界的文化现象。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正因为如此，詹姆逊等人将其称之为文化霸权或文化帝国主义。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绝不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国内外有学者认为，现代性文化的全球化过程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征服世界总体战略的一个部分，对此，不应一概而论，而应该辩证地加以分析。如果作为“征服世界总体战略的一个部分”，那就意味着一种主观设计，但实际上，资本全球化以及由资本逻辑所主导的现代性文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说，现代性文化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因而，它是一种历史性的客观存在。但是，随着这个客观的历史过程的不断推进，文化殖民或文化霸权越来越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故意，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现代性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是世界性，而世界文化即是普世文化，亦即人们常说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充分体现出现代性文化的本质。普世文化实

则是一种强权文化，即是说，资本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利用其强大的资本力量向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推行其价值观，并以这种价值观作为唯一的价值准则。在当今，美国是世界上资本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因此，詹姆逊认为，全球化实则是美国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全球性扩张，“美国人把美国利益看作是普世的”^③。福山亦认为，全球化是由高科技支撑下的跨国资本对全球市场的占领，是以美国式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乃至社会制度向全球的扩张，其中包括经济的一体化和文化的普适化。“资本主义很可能是最终的规范创造者，因此也可能是现代社会中最后一支教化力量。”^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终结论，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或价值观将终结各地区和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及蕴含其中的价值观。因此，所谓普世价值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自身资本的强势地位，否定其他民族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迫使其他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特别是蕴含其中的价值观。这是对文化本质的严重扭曲和背离。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它深深地植根于一个民族的血液之中。中国古人云，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也就是说，要消灭一个民族，就必须先消灭它的文化；消灭一个民族的文化，就等于消灭了一个民族。显然，没有哪一个民族是自愿或坐等灭亡的，而必然以民族文化为旗帜奋起抗争。当然，这也不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而是一种文化的野蛮性对另一种文化的正当性的践踏而唤醒的文化自觉。

与此相关，世界文化呈现出一种趋向，即单一化，而单一化又是以不平等性为前提或表征的。资本全球化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从而必然导致全球文化的同质化或单一化，即在“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的同时，多样性的民族文化也逐渐被消灭。虽然多样性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在文化霸权的荫翳中，它的生长环境极度恶化，从而导致其发展缓慢，甚至不发展，有的还不断被削弱。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有利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思想的误读，是盲目乐观。应该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全球化的确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但在《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用玫瑰色来描绘资本逻辑及其带来的全球化。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可以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民族文化的生存环境，从而提高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

在社会层面，现代性文化造成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断裂。现代性文化是资本逻辑的显形，体现为文化的资本逻辑和资本的文化逻辑的统一，其极端化表现为一切评价标准都让位于财富积累的尺度。资本逻辑的原则是利润最大化，而利润最大化是以生产效率、消费和需求最大化为基础的，于是，“疯狂地”、无止境地发展生产力就成为它的必然选择，盲目生产、破坏性生产就成为一种常态。贝尔指认道，在现代性文化中，受非理性、非智性所主导，个人被认为是文化判断的试金石，因而，文化与经济结构（技术经济秩序）之间存在着惊人的根本分裂，并进而导致政治的困境。罗宾斯也清楚地看到，一种信奉“贸易与消费是人类福祉的最终来源”的“文化与社会模式的扩张过程一直与各种问题——社会与经济的日益不平等、环境的日益破坏、大规模的饥荒、社会的动荡和骚乱等——相伴随”^⑤。应该说，随着现代性文化的不断推进，这种分裂和困境正在不断地加大加深，特别是现代性文化日益被政治、军事甚至战争所绑架，整个世界正在陷入“现代的灾难”（马克思语）之中。

在资本的现代性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仅造就了资本主义的空前繁荣，同时，也给人类的未来走向指明了方向。一方面，共产主义正是以世界历史的形成为前提，“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⑥。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必须占有并利用资本，使之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因此，把资本变成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成社会财产。”^⑦在这种条件下，资本的主体性已经回归于人自身，人的主体性地位凸显，因而，资本回归其客体本性，成为由人驾驭并以人为目的的工具或手段，而且，作为历史性的存在，资本会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这些思想中内在地包含着对现代性文化出路的揭示。

毫无疑问，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现代性文化的出路只有一条：终结。正如资本及其逻辑必然终结一样，现代性文化也必然终结，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把资本变成公共的、

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并不是要马上消灭它，而是要占有并利用资本。资本及其逻辑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在它所能释放的全部生产力释放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同样，现代性文化的终结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不能完全脱离资本这个现代社会的根基，也不能完全脱离现代性文化发展的轨道，而是要充分利用资本以及现代性文化来发展和壮大自身。一方面，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地壮大并利用资本力量，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成为现代性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从而逐步改变现代性文化的某些基因，并进而引领现代性文化的发展方向，为最终终结现代性文化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造就“富有的人”，瓦解资本的主体性和资本逻辑。“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⑧，而“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⑨。也就是说，把人从物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使主体性真正回归于人，使人成为具有全面需要并全面发展的人。在人的全面需要中，特别要注重人的精神需要及其满足，而人的精神需要及其满足成为现代性文化终结的前提条件。“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⑩显然，马克思所讲的“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包括资本逻辑在内，或者说，主要是指对资本逻辑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

注释：

①④ [英] 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277页。

②⑤⑥⑦⑩⑪⑬⑮⑲⑳㉑㉒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5、35、35、38、35—36、591、34、34、36、46页。

③ [美] 阿瑞夫·德里克：《全球化的现代性、文化及普世主义的问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⑧ 参见王善平：《现代性：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联姻》，《哲学研究》2006年第1期。

⑨ 吴晓明：《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

⑪⑫⑬⑮⑲⑳㉑㉒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566、541、550、525、551、539、541—542页。

⑬⑭⑮⑯ [美] 理查德·罗宾斯：《资本主义文化与全球问题》，姚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7、5、“英文版序言”第1页。

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1页。

⑱ [法]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32页。

⑳ [法] 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

㉑ [美] 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㉒⑳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7、90、172页。

㉒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2、296页。

㉒ [美]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

㉑ [德]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公司2006年版，第121页。

㉑ [美] 詹明信：《全球化与政治策略》，刘春荣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页。

㉑ [美] 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刘榜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页。

作者简介：张三元，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30205。

（责任编辑 胡 静）